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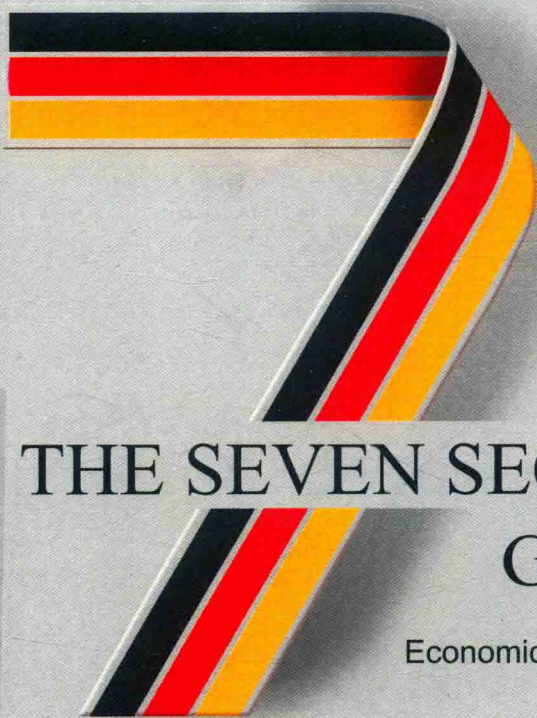
文库

青木昌彦 主编
吴敬琏

德国的七个秘密

全球动荡时代德国的经济韧性

[美] 戴维·奥德兹 (David B. Audretsch) 著
[德] 埃里克·莱曼 (Erik E. Lehmann) 著
颜超凡 译



THE SEVEN SECRETS OF GERMANY

Economic Resilience in an Era of
Global Turbulence

中信出版集团

海外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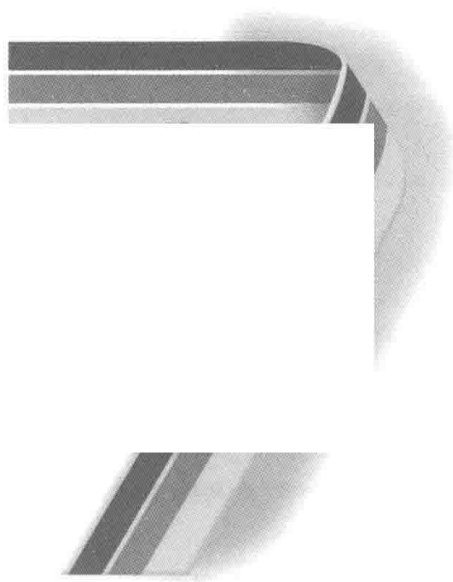
德国的七个秘密

全球动荡时代德国的经济韧性

〔美〕戴维·奥德兹 (David B. Audretsch) 著

〔德〕埃里克·莱曼 (Erik E. Lehmann)

颜超凡译



THE SEVEN SECRETS OF / Economic Resilience in an Era of
GERMANY / Global Turbulenc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的七个秘密 / (美) 戴维 · 奥德兹, (德) 埃里克 · 莱曼著; 颜超凡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11

书名原文: The Seven Secrets of Germany

ISBN 978-7-5086-9225-8

I. ① 德… II. ① 戴… ② 埃… ③ 颜… III. ① 经济发
展—对比研究—德国、美国 IV. ① F151.64 ② F1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4643 号

The Seven Secrets of Germany by David B. Audretsch and Erik E. Lehmann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The Seven Secrets of German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6.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德国的七个秘密

著 者: [美] 戴维 · 奥德兹 [德] 埃里克 · 莱曼

译 者: 颜超凡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 01-2017-1353

书 号: ISBN 978-7-5086-9225-8

定 价: 58.00 元

印 张: 16.75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登字第 9187 号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我们的孩子

汉娜、克里斯多夫、詹姆斯和亚历山大

总 序

作为 CIDEG 文库的主编，我们首先要说明编纂这套丛书的来龙去脉。CIDEG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的英文简称，成立于 2005 年 9 月的 CIDEG，得到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需要不同科学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而且，参加者不应仅仅来自学术圈和学校，也应有政府和企业界。我们希望把 CIDEG 办成类似斯坦福大学非常著名的公共经济政策研究中心（Stanfo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IEPR）那样，对能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和政策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在深层知识的产生上发挥作用。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政府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定位和边界至关重要。CIDEG 的目标是致力于“制度变革与协调发展”、“资源与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组织、监管及政策”为重点的研究活动，为的是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及教育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学习和协调。

2005年9月28日 CIDEG 召开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与环境”的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正是中国当今的产业和环境状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几十年历程，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它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当其他一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时候。不过，中国今后是否可持续增长，却是世界上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源约束和环境制约，腐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糟糕的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足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来自教育、环境、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冲突。这些挑战和冲突正是 CIDEG 将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发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对发展模式的调整，号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增长模式、提高增长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也为 CIDEG 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更有利的前景。

而中国对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显然刚刚开始，中国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最近《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气体的排放？建立一个排放权的市场是否对控制尾气排放有效？如何资助新环境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经济学素养。而建立一个环境监管体系，就不仅涉及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更需要对广泛社会问题的考量。环境污染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成本 and 价值的重新分配问题，因而要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考虑环境监管。并且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环境污染的源头在发生改变，监管体系也就应该随之改变。

还有公共卫生问题，比如 SARS、疟疾、艾滋病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传播，如何控制这些病的流行，不仅需要医生的合作，而且涉及许多移民的工作、生

活和环境等问题。我们会面对许多类似的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方法要看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就要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是独特的。但是，由于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有些研究需要与过去同是计划经济的中欧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较。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开始阶段农村人口都占很大比重，传统社会规则是农业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生发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发展形式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很不一样，也与俄罗斯等国不太一样。所以，在面对这些既有共同点又有独特性的问题时，比较研究会很有意思。虽然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框架，但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社会保障、养老金问题、环境问题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国家学到许多经验。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与环境的社会冲突方面，我们可以从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环境立法、产业发展协调中学到许多教训和经验。所以，对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研究应该是全球化的。

比较经济制度分析是一种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制度如何演化。不同制度可能会融合，可能会继续保持差异。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政策不一定是普遍适用的，在某些国家可能容易实施，其他国家也许不行，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充分利用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收集和整理这些成果以做进一步的交流，是十分可取的途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较、借鉴和学习也成为 CIDEG 学术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 CIDEG 理事长陈清泰的倡议，我们决定翻译并出版这套“CIDEG 文库”，介绍不同国家是怎样从农业国家发展为现代国家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是如何处理与环境的矛盾的。这套丛书的内容选择非常宽泛，从学术的到非学术的都在其内，目的就是给中国的读者——学生、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以及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CIDEG 理事和学术委员为文库提供了第一批书目，并成立了编委会，今后我们还会陆续选择适当的图书编入文库。为此，我们感谢提供出版

书目的 CIDEG 理事和学术委员，以及入选书籍的作者、译者和编辑们。

青木昌彦

吴敬琏

2006 年 4 月 10 日

序

2003 年 11 月我们聚首耶拿时，德国正深陷经济泥潭，失业现象令人忧心，自我怀疑情绪日益弥漫，眼看这个国家就要如此焦虑不安地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自从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1990 年 10 月 3 日重获统一激起一阵兴奋之后，德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停滞不前，以致这个曾经分裂之国双方的人民，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实现了什么。西部人对“统一税”（或称团结互助税）的怨恨与日俱增；东部人（尤其是老一代）则兴起缅怀往昔稳定的共产党政权下可预测的生活品质。

我们受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Society，简称马普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Peter Gruss）博士委托，负责创建并指导马普经济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Economics）在耶拿刚成立的创业、增长与公共政策部门的工作。同事问起怎么没给新部门取个德国名称，我们的回答惹来一片哗然：德语中没有表达“企业家精神”的词汇。与其最接近的概念为 Unternehmertum，通常是指公司的高级经理。

在一个似乎没有企业家立足空间的国家，我们要去哪儿寻觅富有才华外加训练有素、热情飞扬的学者启动研究议程，探索德国和其他国家该如何最佳地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与创新精神？在阴冷的 11 月，望着空荡荡的办公室走廊，谁敢想象这样的年轻学者真的会存在。

但是我们竟然找到了。幸得马普学会的慷慨和专业，以及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世界一流声誉，有人发现了我们。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学者，坐三个小时的火车从柏林或法兰克福

赶来加入我们，大家来自不同国家：中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瑞典、美国、印度、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哥伦比亚、葡萄牙。这些学术和国家背景大相径庭的年轻学者齐聚耶拿，不仅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创业、创新，也讨论如何最充分地利用这两股力量促进社会共同发展，尤其是促进经济繁荣。

必须感谢所有这些年轻学者，我们从他们的知识探索中学到很多，并深受他们的灵感、精神和乐观所鼓舞。在耶拿，我们与年轻的同事展开漫长而激烈的探讨和辩论，这才诞生了本书呈现的某些最重要的观点。

耶拿并非作者撰写此书的起始地。1985 年戴维来到柏林，最初在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后来成为代理主任兼研究教授直至 1997 年。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观察甚至参与被柏林墙和冷战割裂的德国如何转型为一个统一、自治的国家，并最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成为欧洲的主要经济引擎。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相遇，不过直到 2002 年，埃里克在印第安纳大学发展战略研究所花一年时间完成他的教授论文后，我们才开始携手合作。2003 年我们分别担任马普经济学研究所正、副主任，合作研究的势头也越来越强。事实上，我们的研究所科研团队发现，德国正迅速演变为创业驱动型经济体；我们与朋友兼同事马克斯·凯尔巴赫（Max Keilbach）合著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一书对此做了翔实的描述和解释。

我们的研究超出戴维 2009 年离开马普经济学研究所时的领域，旨在确定哪些因素对德国有效哪些无效，并逐步表明，多个关键因素共同为德国在全球动荡时期提供了某种经济韧性。本书旨在分享我们与马普经济学研究所同事了解到的德国的高度经济韧性，并指出这一点为何以及如何可能对其他国家具有启发性意义。

我们要感谢直接或间接促成这部作品的众多同僚。首先郑重致谢马普经济学研究所的同事以及各个领域的学者，他们参与研

*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2006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究并奉献想法、灵感和精力，努力从新颖的角度看待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繁荣兴旺的因素和力量。感谢印第安纳大学发展战略研究所的 Chemain Nanney、Aileen Richardson 和 Sara Cockerham，以及奥格斯堡大学经济贸易系的 Cornelia Noglinski，他们在手稿写作的每一阶段提供了认真细致的帮助与支持。他们为本书付出的辛苦和贡献是无价的，实在感激不尽。我们还要感谢几位传统中小企业和管理者的宝贵建议，尤其是 Alexander Starnecker、Manfred Starnecker 和 David R. Eisenbeiss。

最后，要特别致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经济与金融执行编辑 Scott Parris 和他的助理编辑 Cathryn Vaulman 对本书的坚定支持。非常感谢他们的热情、鼓励以及对高质量学术和出版物的保障，在指导作品从初稿到最后出版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关心、努力和智慧。

目 录

总序	I
序	V
第一章 引 言	001
第二章 小即是美	017
第三章 诗人与思想家	051
第四章 根与翅膀	083
第五章 基础设施	110
第六章 笔记本电脑和皮短裤	134
第七章 德国制造	151
第八章 当德国人真好	170
第九章 结论：与时俱进	185
注 释	193
参考文献	242

第一章 引言

为什么要写德国？先简单看看它的邻居。欧洲正遭受自“二战”以来最严重、最漫长的经济危机。整个大陆的增长久陷停滞，失业现象愈演愈烈。欧元区的失业率早就攀至两位数。西班牙、希腊等国的失业率超过20%，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高达50%以上。你以为希腊的经济灾难是最揪心的，《大西洋月刊》马上告诉你“西班牙的情况要糟糕得多”。^①法国、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强不到哪里去，增长乏力和令人发愁的失业率已经诱发政治、社会动荡。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警告称：“欧洲可能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纽约时报》跟着刊登了耸人听闻的结论：“欧洲正面临另一轮衰退，几乎没有人拿得出新办法提振增长，对恶化问题的罪魁祸首‘紧缩政策’的政治分歧也由此加深。”^②

这些不只发生在欧洲。欧洲以外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包括美国，自“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以来也一直度日维艰。

但德国例外。尽管欧洲大部分国家或腐败猖獗或经济停顿、失业率攀升，德国却又一次实现了经济奇迹。截至2014年，德国一直保持强势增长，轻松将失业率压至6%以下，享受了几十年创纪录的就业率和最低失业水平。2007—2014年，欧元区危机摧毁了约380万个工作岗位，然而德国丝毫不受影响，继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③诸如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州失业现象几乎消失，失业率仅接近3%。^④随着德国崛起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出口领先国，其出口量也达到新高。^⑤2014年7月，德国的出口额刷新历史

月度纪录，突破 1 010 亿欧元，这表示其出口比上月增加 4.7%，比上年增长 8.5%。^⑥

就在欧洲其他国家大闹经济危机令金融市场风声鹤唳，把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十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逼至近两位数之际，德国让这些市场见识了它雄厚的经济实力。德国的利率降低到低于 1% 的超低水平。^⑦市场当然不会比任何人迟钝——纵使处在经济悲观绝望的汪洋之中，德国仍是充满活力、乐观和成功的经济天堂。

德国并非第一次享受繁华盛世，然而令当前这场经济奇迹更举世瞩目的，是它逆势而动，与大多数邻国（其实是整个经合组织）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全欧洲乃至整个发达世界都经历了经济腾飞，经济增长迅猛，失业率下降到几乎消除了失业现象，战后的经济发展让所有人的财富水涨船高。德国的经济更是欣欣向荣。

1945 年 5 月，希特勒自杀身亡，纳粹主义也以失败告终。一连数月遭盟军地毯式轰炸和精确打击之后，昔日雄伟的中世纪城市和建筑以及两度引发世界大战的强大工厂、车间，只剩下残垣断壁。可以说当时的德国就是一堆废墟。

但在 1946 年，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将这场意料之外的迅速复苏描述为经济奇迹，于是这个术语沿用至今。^⑧德国努力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中爬了起来。有如神助般重生的国家不仅复原了，还发展得如火如荼。^⑨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作为那个时代经济增长动力的工业生产，1950 年飙升了 25.0%，又在次年上涨了 18.1%。这种惊人的高增长势头持续了整整十载，到了 1960 年，工业产值增加了 2.5 倍以上。德国经济奇迹刺激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2/3，就业人口从 1950 年的 1 380 万上升到 1960 年的 1 980 万。20 世纪 50 年代初德国失业劳动力超过 10%，但在 50 年代末，失业率已减至微不足道的 1.2%。^⑩这场经济奇迹几乎将失业率化于无形。

在“二战”后的那段光辉岁月，其他欧洲国家和整个经合组织的增长率、就业水平以及失业率下降程度虽没有德国那么耀眼，但以今天的标准看，也是可圈可点的。别忘了，人们通常认为那是美国经济增长与表现的“黄金时代”。1953年美国的失业率触及相当不错的2.9%，那个十年里只有一年失业率超过5.5%。同样，该十年间英国的失业率也仅略高于2%。事实上，不只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失业率平均在2%左右，全部西欧国家的情况都大致如此。

因此，如果说德国享受了战后的经济奇迹，那么其他发达国家同样享受到了。不同的是，同时代的德国更加突出：它的经济表现绝不像别的发达国家那样只是水涨船高。相反，至少在部分欧洲邻国眼里，德国竟然不可思议地立于经济失望和焦虑的风口浪尖，逆水行舟。更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被绝望的经济阴霾笼罩，但在溯流直上的德国，人们乐观积极，对经济充满信心。

不过，德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所谓的“德国零时”：从第三帝国魔爪下幸存的人们得着手清理“二战”遗留的瓦砾，迎接新的开始。接着，要应对20世纪90年代重新统一后伴随失业率上扬而来的经济萧条和悲观情绪。20世纪进入尾声时，鉴于失业率达两位数、经济增长缓滞，德国的前景可谓暗淡无光。

德国渐渐落在了后头。到20世纪末，法国的人均GDP已遥遥领先于德国，更为堪忧的是，连意大利的人均GDP都要跟德国持平了。《经济学人》给德国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①德国人自己也很迷茫：“我们还待在欧洲阵营里吗？”

德国的经济奇迹从何时起不再是奇迹一直大受争议。但毋庸置疑，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赫伯特·吉尔施（Herbert Giersch），与两名同事卡尔-海因茨·帕克（Karl-Heinz Paqué）和霍格尔·施米丁（Holger Schmieding）概括的“消失的奇迹”，确已发生。^②大多数民众、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甚至学者，都把经济

奇迹的终结归因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以及1990年10月3日德国的统一。柏林墙倒塌之前，联邦德国有着活跃的经济增长：1987年为6%，1988年为5%。可是到了1993年，增长止步，经济萎缩了1%。在20世纪9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增长率从未超过2%，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其间失业率持续上升。尽管柏林墙倒塌时失业率为7%左右，但随后跃至骇人的两位数水平，在该十年的中期攀升至12%以上。失业大军日益壮大，从德国统一时的约250万人，膨胀到该十年末的近500万人。经济奇迹真的消失了。

关于这场奇迹谢幕的解释五花八门。赫伯特·吉尔施领导的学者团队指出，单位劳动成本和国际外汇市场的币值已双双上升。^⑬根据吉尔施、帕克和施米丁谨慎、细致的分析，经济增长奇迹很大程度上源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低于整体生产率的增长，加之马克币值的低估，德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极具竞争力，从而引发了出口爆发式增长。^⑭可是，随着生活水平和工资的上涨速度渐渐超过生产率增长，德国的竞争力开始下滑。到了1994年，德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中位数（含社会保险及其他员工福利）已达每小时25.71美元，远高于美国的每小时16.73美元和日本的每小时19.01美元。^⑮

德国也许先于其他国家预见到柏林墙倒塌后将触发冷战终结，从而开启和平红利。以前因为不断受东部“敌人”的威胁，德国不得不分出资源打冷战和保护国家的生存能力；现在则可以把原来用于国家安全的经费，转而投资于生产性用途。

但是大家等了很久，和平红利可望带来的经济繁荣也未曾出现。德国创造经济奇迹，是因为其竞争力强于西方盟国。然而冷战结束后，新的挑战从另外的方向袭来——东边的欧洲和亚洲。比如德国统一后的1992年，波兰的每日劳动收入只有6.14美元，捷克共和国为6.45美元，中国为1.53美元，印度为2.46美元，斯里兰卡为1.25美元，和欧盟国家的78.34美元根本不可同日

而语。^⑩

当然，劳动力成本差异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和技术取代劳动力来抵消。德国和所有国家一样，承受着新的经济全球化竞争。但不同于其他国家，德国刚刚吸收了1 800万生产率极其低下的人口。^⑪据估计，民主德国的生产率约为联邦德国的40%~70%。^⑫德国生产率被拖累的同时，正赶上新的全球性竞争，因而对竞争力产生了剧烈冲击。

全球化和统一这两股力量，似乎更严重地影响了德国。然而，响应全球化新时代的不只是经济滑坡。决策者和商业领袖望向大西洋的彼岸，他们看见了20世纪90年代繁荣的美国。^⑬美国并未逃过工厂倒闭和规模缩减，当时大规模裁员的报道不绝于耳。但在20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抬至更高水平，失业现象也几近消失。

大西洋两岸明显依循了不同的轨迹。1991年，美国的人均GDP只比德国高2 000美元。十年后，这一生活标准的差距激增至12 000美元。显然德国的发展路径不对。^⑭可美国又是怎样走上正确方向的呢？

答案就在于竞争优势的转移。如果说大型工厂（或经济学家所称的物质资本）推动了后“二战”时代的经济繁荣，那么全球化则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转移至亚洲、东欧和中欧的低成本国家。^⑮诚然，世界依旧对这些产品有巨大需求，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竞争性生产从北美、西欧的高成本国家，转向亚洲和东中欧的全球经济新进入者。那是美国个人电脑、软件、半导体等高技术创新产业势如破竹的十年，不仅带动了经济表现，也降低了失业率。新公司，如苹果、微软等，由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这些胆识过人的企业家引领，弘扬创新创业精神，开辟了美国史无前例的民富国强之路。^⑯

再看看大西洋彼岸的德国，景色未免萧索。后来担任外交部部长追随格哈德·施罗德总理的绿党成员约施卡·费舍尔（Josch-